

晉書

晉

書

三

志

晉書

唐房玄齡等撰

第一卷
一至卷一〇（紀）

中華書局

晉 書

(全十冊)

〔唐〕房玄齡等撰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裝

*

850×1168 毫米 1/32·106 9/16 印張·1880 千字
1974年11月第1版 1974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統一書號：11018·640 定價：10.10 元

晉書

唐房玄齡等撰

第 二 冊
卷 一 一 至 卷 一 八 (志)

中華書局

晉書

唐房玄齡等撰

第三卷
一九至卷三〇（志）
冊

中華書局

晉書

唐房玄齡等撰

第 四 冊
卷三一至卷四五(傳)

中華書局

晉書

唐房玄齡等撰

第五卷
卷四六至卷五九（傳）

中華書局

唐房玄齡等撰

晉書

第 六 冊
卷六〇至卷七四（傳）

中華書局

晉書

唐房玄齡等撰

第七冊
卷七五至卷八八（傳）

中華書局

晉書

唐房玄齡等撰

第八冊

卷八九至卷一〇〇（傳）

中華書局

晉書

唐房玄齡等撰

第九冊
卷一〇一至卷一六（載記）

中華書局

晉書

唐房玄齡等撰

第十冊
卷二七至卷三〇（載記）

中華書局

出版說明

一

《晉書》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紀十卷，志二十卷，列傳七十卷，載記三十卷，唐房玄齡等撰。它的敘事從司馬懿開始，到劉裕取代東晉爲止，記載了西晉和東晉封建王朝的興亡史，並用「載記」形式，兼敘了割據政權「十六國」的事蹟。

《晉書》的修撰，從貞觀二十年（公元六四六年）開始，二十二年（公元六四八年）成書，歷時不到三年。參加編寫的前後二十一人，其中房玄齡、褚遂良、許敬宗三人爲監修，其餘十八人是令狐德棻、敬播、來濟、陸元仕、劉子翼、盧承基、李淳風、李義府、薛元超、上官儀、崔行功、辛丘馭、劉胤之、楊仁卿、李延壽、張文恭、李安期和李懷儼。天文、律曆、五行三志，出自李淳風之手；修史體例，是敬播擬訂的，沒有流傳下來。由於李世民（唐太宗）曾給宣帝（司馬懿）、武帝（司馬炎）二紀及陸機、王羲之兩傳寫了四篇史論，所以又題「御撰」。

唐代以前寫成的晉史有二十多種，在唐初，除沈約、鄭忠、庾銑三家《晉書》已亡佚外，其餘都還存在，當時認爲「制作雖多，未能盡善」，所以李世民才下詔重修。在修撰《晉書》

時所能見到的晉代文獻，除上述專史外，還有大量的詔令、儀注、起居注以及文集，可供採擇的資料應當說是很豐富的。但該史編撰者只用臧榮緒《晉書》作為藍本，並兼採筆記小說的記載，稍加增飾。對於其他各家的晉史和有關史料，雖然也曾參考過，卻沒有充分利用和認真加以選擇考核。因此成書之後，即受到當代人的指責，認為它「好採詭譎碎事，以廣異聞；又所評論，競為綺艷，不求篤實」。劉知幾在《史通》裏也批評它不重視史料的甄別去取，只追求文字的華麗。

二

李世民統治時代所修的前代史書，在《晉書》之外，還有梁、陳、北齊、周、隋五代史，何以李世民偏要選擇《晉書》來寫史論呢？這主要因為西晉是個統一的王朝，它結束了三國時期幾十年的分裂局面。然而它的統一又是短暫的，不久就發生了中原地區的大混戰，此後便形成了東晉和十六國、南朝和北朝的長期對立。李世民作為統一的唐朝的創業之君，很想對於晉朝的治亂興亡進行一番探索，作為借鑑。正由於這個緣故，所以把西晉王朝的奠基人司馬懿和完成統一事業的司馬炎當作主要研究對象（關於陸機、王羲之的史論，主要着眼於他們的文學藝術成就，屬於另一種情況，姑置不論）。宣帝（司馬懿）、武帝（司馬

炎)二紀的史論，雖然比較籠統，沒有觸及晉朝治亂興衰的實質，但它指出司馬炎「居治而忘危」，「不知處廣以思狹」，「以新集易動之基，而無久安難拔之慮」，這些評論總算是看到了一些現象。

《晉書》成於衆手，它的觀點並不統一。就全書而論，史官們並沒有完全貫徹李世民的意圖。況且編撰者當中，有不少是反動儒生、無識文士，他們主要不是從總結治亂興衰的歷史經驗着眼，而是企圖用宣揚儒家倫理綱常的手段來「敦勵風俗」，為鞏固封建統治服務。於是突出孝道，成為《晉書》的一個顯著特點。史官在類傳中設立了「孝友」的名目，網羅了一批所謂「孝悌名流」，給他們樹碑立傳。《孝友傳·序》開宗明義地說，「大矣哉，孝之為德也」，「用之于國，動天地而降休徵；行之于家，感鬼神而昭景福」，「晉氏始自中朝，逮于江左，雖百六之災遘及，而君子之道未消，孝悌名流，猶為繼踵」，「採其遺絢，足厲澆風」。這裏明確提出了他們立傳的目的。其實本書鼓吹孝行，決不限於《孝友傳》一卷，在其他列傳裏，也無不千方百計地在這一問題上大做文章。如《王祥傳》刻意描寫他的臥冰得鯉，黃雀入幙；《吳猛傳》竭力渲染他「手不驅蚊，懼其去己而噬親」，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本書吹捧的「孝悌名流」，有些被後世的反動統治者奉為「孝子」的典型，甚至列入《二十四孝圖》，流毒很廣。

除宣揚孝行而外，多記鬼神怪異、因果報應，也是《晉書》的特點。這決不單純是爲了獵奇或「以廣異聞」，其中許多故事，顯然是有意識地在鼓吹宿命論觀點。除在《郭璞傳》全篇充滿宿命論以外，其他各篇也屢見不鮮。如《劉聰載記》說，聰子約死而復甦，對人說曾見到已死的劉淵，他正在做蒙珠離國的君主。劉淵預言，三年後劉聰將死，一個遮須夷國國主的位置正等待他去填補。作者企圖通過這段鬼話來告誡人們，人生的窮通壽夭莫非命定，比如劉聰，他在人間的政治地位和壽數，都是冥冥中早已注定的，而作爲一個統治者，不僅活着的時候可以稱王稱帝，即使死後到另一「世界」裏，仍然有他的特殊地位，與衆不同。又如《阮瞻傳》，前面明明說他「素執無鬼論，物莫能難」，結尾却偏要捏造出一個鬼來把他嚇死。在史論中，也公開宣揚因果報應，如《良吏·鄧攸傳》的史論說，「勿謂天道無知，此乃有知矣」，編撰者的反動觀點暴露無遺。

孝道和宿命論，是作者爲了達到維護封建統治的目的而使用的兩種反動手法，它們是相互補充，相互爲用的。作者在鼓吹孝行的同時，往往就和因果報應緊密聯系在一起，如《孝友傳》裏的何琦，即因「孝心」的「精誠所感」，使他避免了一場火災。類似的例子很多，不一一列舉。總之，作者是在販賣這樣一條反動邏輯：由於人生的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所以只能「安分守己」，不應當有任何「非分」之想；除「安分」之外，如果還能奉行儒家的

一套倫理綱常，特別是「孝悌之道」，那麼「天」就會「降福」，使你得到一些額外的好處。史官們就是妄圖用這種反動伎倆來愚弄人民，麻痹人民的鬥志，以達到所謂「民用和睦，上下無怨」的局面。

「孝」作爲一種道德標準，從它出現之日起就是爲反動階級服務的。孔丘及其門徒，就是「孝悌之道」的狂熱吹鼓手，其根本目的是妄圖實現「克己復禮」的反革命復辟綱領。戰國末期，大商業奴隸主、儒家的代表人物呂不韋也瘋狂叫嚷「務本莫貴於孝」，以反對商鞅所推行的以農爲本的耕戰政策，陰謀顛覆新興的地主階級專政。當地主階級鞏固了自己的統治，它和農民的矛盾激化之後，反動統治者又乞靈於「孝道」，作爲束縛勞動人民的精神枷鎖。看一看「孝道」的產生和發展過程，就不難發現它的反動本質。當然，無論是單獨宣揚孝道，或把孝道與其他反動觀點結合在一起，都不可能達到鞏固反動統治的目的。晉代的歷史，就對於《晉書》作者自欺欺人的謊言作了無情的駁斥。儘管晉王朝的統治者標榜「以孝治天下」，晉朝又是孝子成堆的時代，却並沒有能挽救它的滅亡命運。毛主席說：「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歷史是按照這一規律來發展的，反動統治者及其御用史學家，無論玩弄什麼手段，永遠也改變不了歷史的規律，永遠也阻擋不住歷史的